

一代影星

阮玲玉



● 温 华

阮玲玉是我国30年代初蜚声影坛、被誉为“一代艺人”的著名电影明星。她16岁从影，在短短的9年中，连续演了29部影片。她在影片中分别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，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，其中有村姑、贤妻、女佣、尼姑、舞女、贵妇、女大学生、作家、女工等。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。有的自杀，有的入狱，或者被逼疯，或者病死街头。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，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。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，激起观众无限的同情和共鸣。阮玲玉也因此成为成千上万的观众为之倾倒的电影名星。

可是，我国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，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，过早地失去了生命。

苦难的童年

阮玲玉小名叫凤根，祖籍广东中山（原名香山）南蓊区左步乡人。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，父亲名字叫阮用荣，是上海浦东亚西亚火油机器部的工人。工资微薄，一家3口的生活甚为贫苦。阮玲玉5岁时，父亲患伤寒病，不治逝世。

父亲死后，遗下寡母孤女，无以为生，阮玲玉的母亲迫不得已，经好阿姨牵针引线，只好带着幼女到张公馆当佣人。

凤根在公馆里侍候小姐，小姐嫉恨凤根长得比自己漂亮，觉得有损自己的尊贵，不多久，就赶走了凤根。

一年过去了。凤根每天孤单地畏缩在佣人住的小房间里。母亲觉得孩子不能整天过这种抑郁的生活，她咬紧牙关以自己的微薄收入，送凤根去四川北路一家私塾读书。

凤根读了一年私塾，厌烦那种呆板的读书方式。她看见不少同学转到洋学堂读书，十分羡慕。回到张公馆，她央求母亲把她转到洋学堂去。

“我也早这么想”，妈妈告诉女儿，“我已经为你联系了崇德女子学校，只是要住在学校里念书。”

妈妈又告诉凤根：“张家不允许佣人的孩子念书，我对张公馆说，你被好阿姨接去了，以后星期放假，不要来张公馆看我，有人问你，就说是好阿姨抚养大的，问你阿妈是谁，就说不在了。为了掩饰凤根的身份，妈妈给凤根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玉英。第二

天,阮玉英告别了母亲,住进了崇德女子学校。

在学校里,玉英天资聪慧,又肯用功,所以学习成绩拔尖,尤其在音乐和歌唱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。学校里,每年大考结束,都要举办家长恳亲会。玉英央求妈妈参加,亲眼看一看女儿的表演。妈妈终于答应了。

恳亲会上,学校礼堂张灯结彩,演出节目开始时,玉英放眼向场内望去,家长席没有母亲。玉英不由怅惘起来。

演出开始,第一个节目是英语讲演,玉英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第二个节目是阮玉英独唱歌曲。玉英走上了舞台,但眼睛依旧茫然地向台下张望。突然,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位置,她看见了妈妈。就在这一刹那,她的歌声比任何时候都甜润,把在座家长的心都打动了。

“挂名夫妻”

恳亲会的第二天,玉英到张公馆看望妈妈。一进门,从后厅传来“太太丢了钱!”的叫喊声。张太太怀疑是玉英妈偷去的,不由分说就破口大骂。

妈妈强忍下这天大的冤屈与侮辱说:

“太太,我永生永世记得您怜悯我母女的恩德,想好好服侍您。我怎么做那种事,我没有偷。”

这时,突然从厅外进来一个人,边走边说:“钱不是阿英娘偷去的。”全屋的人抬头一看,原来是小小少爷张达民。

“你怎么知道钱不是她偷的?”太太惊奇地问。

张达民回答:“我昨天回来,向妈妈讨零钱用,你正打牌,输了钱,我不敢要,就进屋拿了。”

但有权势的张太太,为了维持尊严,那肯罢休,就把玉英母女赶出了张公馆。

茫茫的大上海,何处是母女俩的安身之所?

正在这时,小小少爷张达民从后面赶来说海宁路鸿庆坊有一幢房子,可先歇歇脚。这房子是张家老爷蓄养外妾的小公馆,后来姨太太被张太太逼走,房门便交给张达民掌管,是张达民和朋友玩乐打牌的地方。

达民将玉英母女带进房子说:“说实话,我也没拿太太的钱。只是怕你们受屈,才自己招认的。”

玉英呆呆地望着他,觉得,这小小少爷也许与其他富家子弟不同,虽然学业不好,但心地还是善良的。临走,张达民还给玉英母女留下了生活费。

玉英母女的感激和信任,使张达民感到他有了支配这母女的理由。过了几天,张达民终于向阮妈妈提出想娶玉英为妻。出于感激之情,玉英母女答应了张达民的要求。

于是,他们不声不响地结合了。此时,玉英只盼能与达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和睦夫妻。可是张达民几次回来都摇头说:“我娘不同意,说等等看。”纯真的玉英没有多想,只是期望着等待着。

玉英与达民结合后,她不愿达民掏钱供养,也不忍妈妈再去当佣人。她想找一个职业,自己挑起家庭的重担。

1926年3月的一天,一张《新闻报》刊登一则广告:上海明星公司为拍新片《挂名夫妻》公开招聘主角女演员。这则广告点燃和唤醒了蕴藏在玉英心头的艺术火焰和灵感。她鼓起少女的勇气,决心去报考。

在登出广告的第二日,玉英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目前的处境,借用了同学杨碧若的住址,特地改了一个名字叫阮玲玉。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去投考。

明星公司的影片导演、主考卜万苍正为没有选得一位合适的女主角而犯愁。

导演要阮玲玉做各种小品。阮玲玉感情充沛,表演得自然率真,没有半点矫揉造作。

卜导演高兴地宣布:“阮小姐,你考取了!”

阮玲玉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被录取,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。她赶忙回家向妈妈报喜,阿妈高兴得满眼泪花。她等着达民回来告诉他喜讯,但达民一连三天都没来。

第四天,玲玉接到拍片的通知。拍片名叫《挂名夫妻》。

阮玲玉的第一场戏是拍新婚之夜的悲伤与痛苦。

阮玲玉做好表演准备,等导演下令“开拍”,在那令人眩目的炭精灯下面,阮玲玉过分紧张,忘了在演戏,第一次拍片完全失败了。

阮玲玉羞愧地走出摄影棚,几天来的美梦破灭了。没想到回到家里,张达民说他父亲前天中风死了。要她去吊孝。

阮玲玉一进张公馆,就觉得火药味压抑了悲怆气氛。阮玲玉在灵前跪拜。这时,身穿丧服的张太太冲进来叫着:“陌生人吊孝,骗顿豆腐饭吃!你们这些不要脸的,想趁此捞锡箔灰,发横财!还有人冒充张家媳妇!”

一天,见同学杨碧若兴冲冲地迎过来:“玉英!明星公司拍戏通知!”玉英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她把上次失败的经过告诉了杨碧若。杨碧若鼓励她要鼓起勇气,充满信心,一定会成功的。

阮玲玉又去了。上次化妆穿的是新娘服,没想到这次改成穿一身素白的孝服。在卜导演的引导下,阮玲玉走近为拍戏布置的灵堂,这是《挂名夫妻》中傻丈夫死后妻子愧恨悲伤哭灵的一幕。她望着灵堂,心里思忖,这戏中虽是挂名夫妻,倒也堂堂正正,有个名份。自己和达民的结合,却倍受张家歧视,连哭丧的权利都没有,就因自己是佣人的女儿。想到这里,不禁心酸,压制不住内心的悲痛,哭倒在“傻丈夫”的灵前。

卜导演兴奋极了,高叫着:“成功了!”

机器停住了,阮玲玉还在抽泣。助理导演给她一个信封:“我们公司聘请你为正式演员。这是本月工资。”

阮玲玉又兴奋又激动地回到家,把50元的工资交给妈妈。张达民却沮丧地告诉她:“我娘发脾气了,要把这房子收回去,她不许你们住在这里。”

“我们自己去租,我有了工作。”阮玲玉抬起了头。

阮玲玉租到了老靶子路一间厢房和一个亭子间,她满心欢悦,房屋虽不及鸿庆坊,但这终究是自己的家呀!

第一次自杀

阮玲玉连续为“明星”拍了《血泪碑》、《杨小真》、《奋斗的婚姻》和《洛阳桥》。她的表演逼真动人,博得同事们的好评。但也受到一些“红星”的刁难。1928年冬,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招考女演员,在数百名报名者中,公司经理和导演朱瘦菊等人选中了阮玲玉。

阮玲玉进了大中华百合公司后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先后拍了5部戏。这些影片都是朱瘦菊编导。朱瘦菊专写巨公名流的隐情秘史,以招徕观众。实际上渲染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糜烂生活。这样的影片没有什么价值,还有害于观众。为此,阮玲玉泄了气,懊悔不该离开明星公司。而这时的明星公司也开始搞怪诞的武侠一类的影片。追求艺术真谛的阮玲玉陷入了彷徨与苦闷之中。

艺术追求的失望与生活上的不顺利缠在一起,把一个弱女子推向绝境。张达民借口母亲不许与阮玲玉来往,很少看望玲玉,有时半个月才露一次面,也来去匆匆,躲躲闪闪的。阮玲玉想和他谈谈,张达民带着为难的神色,重复这一句话:

“我实在没办法,不能天天来。”

阮玲玉有几次问达民:为什么不去找个事情做?

“我爸爸是大财主,我自幼自由惯了,受不了管束。”

“用你那一半遗产办点什么事也行。”

“这点能派多少用场?能赌几圈?”张达民很不耐烦,无意中透露出他的赌场生活。

阮玲玉大吃一惊。原来达民也是一个热心的赌徒。阮玲玉默默地流着泪。非正式的婚姻充满屈辱,张达民又这样不争气,电影事业坎坷多艰;好同学杨碧若突然失踪,这一切,没有一件事不使她断肠,她绝望了。

不久,联华影片公司邀请阮玲玉拍一部由孙瑜导演的新片《故都春梦》,重新唤起阮玲玉对电影的喜爱与追求。

桃花泣血

阮玲玉在《故都春梦》里扮演妓女燕燕,孙导演

要她详细分析燕燕这类角色,以及在生活中曾经接触过的同一类人物。阮玲玉不断的琢磨、思考,她想起了张公馆那些姨太太的无耻泼辣,特别是张太太的虚伪凶狠,她把这些人外形和内心凝聚在一起,饰演了一个性格鲜明、与众不同的妓女。《故都春梦》公映,使人耳目一新,成为中国进入30年代第一部有一定水平的好影片,受到了观众的好评。

1931年九·一八事变,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。上海各阶层的群众举行反对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,日本海军虎视眈眈,要在上海发动战争。上海已经是战云密布,一触即发了。

联华影片公司动员演员们先去香港暂避一时。在林楚楚的动员下,阮玲玉携同张达民前往香港,由妈妈在家照料房屋财产。

1932年初,阮玲玉在香港。上海爆发了十九路军同人民大众抗击日本侵略的一·二八抗战事件。阮玲玉心里惦念着上海和妈妈。而张达民却不愿离开香港。

他们在香港呆了一个多月,阮玲玉带的钱已经为数不多了。好心的林楚楚,托人把张达民安排在香港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买办。这是个舒服而又体面的差使。上海战火稍息,阮玲玉准备回上海,临走前一再哀求似地嘱咐张达民,在香港千万不要惹事生非,就回上海了。

阮玲玉回到上海,同妈妈和养女小玉团聚,找到留在上海的电影界同行金焰等,观看了黄绍芬和黎英两个冒着炮火拍摄的《十九路军抗战史》等爱国热忱高涨的影片,很受鼓舞。

这时,《三个摩登女性》的剧本印出来了。这个剧本描写三个不同性格的青年女子:南国姑娘虞玉天真浪漫,城市少女陈若英以死殉情,被情人抛弃的周淑贞发愤自强。参加了民众的斗争,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性。

阮玲玉主动去找导演卜万苍要求饰演周淑贞。

《三个摩登女性》第一天公映,观众对阮玲玉赞誉声不绝于耳,报以热烈的掌声。谁料到,银幕下的阮玲玉,却遭到痛苦的打击,混世魔王张达民在香港闯祸归来。

自阮玲玉走后,张达民在香港最感兴趣的还是赌场,每逢假日,他总是到澳门赌钱,不多久,就把预支的薪水输光了,还借了债。

阮玲玉气得没办法,再一次忍下来。用积蓄还清张达民的债务,期待他能回心转意。不久,又托人把他介绍到福建省福清县做临时税务监督。自己便投入电影《城市之夜》和《人生》的拍摄。阮玲玉以激越而深沉的感情投入了角色的塑造。正当拍摄进入紧张阶段,张达民从福建回到上海。一见面就挑战式地对阮玲玉说:“你是大明星,有名有利了,却把我支到福建去吃苦,告诉你,我现哪也不去。”

阮玲玉再也不愿同这个可恶的骗子联系在一起

了。银幕中一个个恶棍形象，还原为世间恶人张达民，她无法再忍受了。阮玲玉提出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一刀两断！”

张达民没有想到阮玲玉敢于反抗，他先是一愣，知道无可挽回，便说：“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就可以分手。你每月津贴我100元，为期2年！”阮玲玉咬咬牙答应了。

一场恶梦醒来，顽强多艺的阮玲玉用满腔的情与爱，却换来了个桃花泣血，告别了过去的梦，却仍在梦中行。在混噩黑暗的社会里，等待一个女影星的明天，会是怎样的呢？

遇上了“茶大王”

阮玲玉同张达民分手后，又主演了朱石麟导演的《归来》。为了庆祝朱石麟导演第一部影片的成功，联华公司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举行宴会。除了电影圈内的朋友外，还邀请圈外人士参加。在阮玲玉隔壁有一位彬彬有礼的中年男子。林楚楚向阮玲玉介绍说：“这就是茶大王唐季珊。”

不久，阮玲玉与金焰合作拍摄《再会吧，上海》，开拍的第一天，只有一面之交的唐季珊来到联华摄影棚，送给阮玲玉一只精致的花篮，诚恳地说：“我在美国，看到好莱坞都有这套礼节。”说完，匆匆离去。

几天后，《再会吧，上海》到杭州去拍外景，唐季珊亲自赶到车站迎接，他谦恭地说：“我在这里有茶庄，应尽地主之谊。”他说得合情合理，叫阮玲玉和她的同事们不好拒绝。当晚，唐季珊在松鹤楼请客，还特地为阮玲玉租了豪华房间。剧组返回之前，又送给每人一份精装茶叶。他笑着对阮玲玉说：“阮女士喜欢喝茶，我过几天派人专程送上。”

外景队回上海后，唐季珊亲自到阮玲玉家中拜访，不但带了茶，还带了人参、燕窝等名贵补品。他看到阮玲玉的房间陈设，感慨又有些埋怨地说：“在美国，像您这样的明星，都是自己买别墅，有好几辆汽车呢！”

阮玲玉一下子想到唐季珊与张织云的事。

“曾记得唐先生和张织云去了美国，为什么分手了呢？”

唐季珊伤心地摇摇头，自责地说：

“怪我自己不好。我原是父母包办婚姻，我不愿意，逃了婚。后来遇见张织云，谁想到她只看中我的财产和地位。她拉拢我，提出要送我她去美国当了电影明星后再结婚。我太软弱，依了她。谁知一到美国，她争吵着与我脱离关系，还要我30万元。我怕闹得风风雨雨，只好依她。后来，她嫁给一个律师，不久又告律师重婚，又要了30万元。以后因开空头支票，被拘进巡捕房。有人说我茶大王怎么坏，玩弄女明星，真是冤枉！”

阮玲玉并不清楚他和张织云之间的事，听了她痛苦的叙述，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和同情。

唐季珊委婉地向阮玲玉求爱。阮玲玉觉得他还热情诚恳，便向好友林楚楚征求意见。

林楚楚说：“他当然比张达民好！”

过了几天，唐季珊跑来见阮玲玉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些小报记者真是造谣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阮玲玉吃惊地问。

“他们造我的谣倒无所谓，竟造到你的头上来。说我和你一起在杭州，还说我早与你同居，好多低级下流的话！阮女士，我真对不起你。”说完唐季珊显出内疚、激愤的样子。

阮玲玉听完这段说述很气愤，转而又有些同情唐季珊。她与他的确没有什么别的关系，他在杭州也是热情助人的。

“要不要我为你去辟谣？”唐季珊说。

“不”阮玲玉断然阻止，“无济于事，只能把事弄大。”

阮玲玉苦恼地问唐季珊：“你有什么办法对付？”

“我刚才想了想，不知你是不是同意？”唐季珊用恳求的口气说：“如果你觉得我还配得上你，我们干脆正大光明地宣布同居，那些谣言也便自生自灭对我们也无损失。如果你不同意。那我，我只好远走美国。我在上海也没脸见人了。”

阮玲玉垂头想了一会：

“你先回去，让我多想一想……”

唐季珊悄然离去。不一会儿就打电话来问：

“你想好了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那么来吧。”阮玲玉回答。

唐季珊很快来了。他带来象征爱情和幸福的玫瑰和一对红宝石的耳环。

唐季珊在新闻路沁园村买了一幢漂亮的小洋房。阮玲玉母子搬进以后，为了防止外面的闲话，两人决定在经济上独立，阮玲玉的汽车和司机都由自己负担。鉴于阮玲玉答应与张达民为期两年的补贴，决定到期满以后再举行婚礼。

不多久，阮玲玉又拍了《神女》和《新女性》等影片。

《新女性》在1934年农历大年除夕举行献映，影片的动人情节、演员精湛的表演，加上聂耳作曲的悲壮激昂的《新女性歌》唱道：“暴风，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；暴风，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！……新的女性，勇敢向前冲！”给了广大群众以很大的激发。然而，这部电影的主题刺痛了国民党当局和那些无耻之徒。他们先借口电影侮辱了报纸记者，要求删剪，公开道歉；然后，策划了一个诋毁阮玲玉的阴谋。

没想到，在《新女性》试映的第二天，来了一个“小滑头”找阮玲玉，说张达民最近很拮据，要阮玲玉再支给他50元。还说：“阮女士是大明星，唐先生是大老板，50元算个啥？”

阮玲玉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唐季珊把小滑头赶走

了。唐季珊埋怨阮玲玉：“张达民要缠你一辈子啦……”说完，气冲冲走了。

一天，突然有人打来电话，阮玲玉一听，是同唐季珊同居又分手的电影演员张织云。

张织云说：“你没有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你吧？不要和我一样上当……”

“上当？”阮玲玉惊奇地问。

“当初去美国是唐季珊要我当明星挣30万。为的是付给他妻子赡养费……我们都是同行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。你戏演得好，千万要珍惜啊！”

张织云最后几句话语重心长，久久在玲玉心里回响。

恶人先告状

阮玲玉心神不安地注视着唐季珊几天来的神情变化，没想到张达民又找上门来。他拿出一张小报，冲着阮妈妈妈说：“你看，我被你女儿弄到身败名裂！”并念道：“红女星被富商金屋藏娇，原丈夫只落得人财两空。”

张达民看着阮妈妈不动声色，就说：“我看是这些小报记者敲竹杠！只要你们肯拿出三五千元的封口费，就太平无事，保住名誉啦。”

阮玲玉同唐季珊商量对策。唐季珊冷笑地说：“这是张达民串通小报记者造谣，这种事我见得多了！这有什么？去年小报报道你和我同居的消息，就是我……”他自知失言，立刻又把话题岔开。

阮玲玉还是听了出来，利用小报记者造谣，制造舆论，迫我同居。为什么和张达民一样使用这种手段呢？阮玲玉心乱极了。

为了澄清是非，阮玲玉请了江律师，代她在报上发表郑重声明：

“阅报登载唐季珊、张达民诉讼案内所述各节，完全与事实不符。玲玉虽系女流，为社会弱者，横逆之来，原可置诸不论，惟念名誉有关，实难缄忍，不得不细述身世藉明真相，以求海内人士主持正言而昭是非。查张达民君于数年前虽与玲玉同居，并未缔结婚约。张君本无正当职业，又复浪荡成性，生活所需渐难维系，在此家庭经济压迫下，玲玉无可奈何，遂投身影界，月得微资，维持生活，张君则安坐而食如故也。玲玉犹冀望其有成，辗转为张君代谋瑞安轮船、闽福清县税所等职务，奈何张君未忘故习，不克终于所职，返中后仍逼玲玉，满足其无边之欲为能事，人生至此哀痛极矣。缘于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四月间双方敦请伍律师证明解除双方关系，玲玉犹不忍见张君飘零，于毫无义务之下每月以一百元助之，以两年为限。此两年中果能改法昨非，力求振作，何尝不可立身扬名。不意今岁为两年届满之期，而张君并不自新进步，亦未能忘情于玲玉供食之初心，遂不惜捏造誓词，变更事实，诬陷侮辱，达于极点，以恐吓手段，以法律为工具以遂其图，谋玲玉于万劫不复之

境而后快。不知天下事是非根据，事实真伪，难逃公评。”……

这个声明，只有几百字，但字字是血泪，述说一个弱女子的屈辱与不平。阮玲玉强忍着忧愤，安慰唐季珊说：“你放心，他们是血口喷人，我们有凭据，等打赢了官司，我和你……”

“和我什么？”唐季珊打断她的话：“你们这些电影明星都是害人精！当初张织云害得我倾家荡产，你又招我吃官司，害得我身败名裂！”说完，拎起偎依在他脚边的小狗娇丽，从窗口扔了出去。那小狗是阮玲玉心爱之物，唐季珊的火是向着阮玲玉发的。

阮玲玉绝望了，心碎了。

以死抗议

阮玲玉决定以死相抗，她的心情恢复了平静。

一天，阮玲玉和唐季珊应邀去黎灼灼家赴宴。在宴席上，她高兴地一再举杯“祝朋友们长寿”，宴会结束，又逐个逐个地紧握手朋友的手，朋友说：“再见”，她心里却默念着：永别了，永别了。

回到家里，唐季珊喝多了酒，倒床就睡。阮玲玉到阿妈房间与阿妈亲热一阵，她不敢多留，怕失去诀别的勇气。她捧着阿妈给烧的八珍粥回到自己房间，打开了安眠药瓶。阮玲玉对这凄楚的社会已无所留恋，但又感到要留下对仇人的控告和亲人的嘱托。她拿起笔来，写下了控告张达民的遗书：

“我现在一死，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，其实我何罪可畏？因为我对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不住的地方。可是他恩将仇报，以怨报德，更加以外界不明，还以为我对他不住。唉，我一死何足惜，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吧！我不死不能明我冤，我现在死了，总可以如他所愿……”

她想起唐季珊，特别想着身后母亲与养女的生活，又写一则遗言给唐季珊：

“我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。请你不要悲哀，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。请你千万节哀为要。我很对不住你，令你为我受罪。现在他虽然陷害你我，但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看他又怎样活着。乌之将死。其鸣也哀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看他们又怎样判你我之罪。……”

好了，有缘我们来生再会，还有公司欠我之人工，请向之收回，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，共2050元，至要至要。

还有一封信，如果外界知我自杀，即登报发表。如不知，请不宣为要。

阮玲玉绝笔

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

（下转第45页）

书。

我自命为三民主义信徒,虽对共产党人士的情深义重五体投地,但对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却心意惶惶。眼看邵力子、孙蔚如等过去党国要人都追随中共大展宏图,认为是被“荣誉所惑”,自己历尽铁窗风云,早已身衰力竭,索然无志,于是婉言退聘。

又是一个严冬日子,爱女告急说,南京的开罗饭店,后曹村的并耕农庄、四牌楼其昌里和塘坊桥别墅“均被指定清算之列”,急得我如锅上的蚂蚁,病急乱求医,求救于已当上部长的陈铭枢。农历正月十五日,接陈复函云:“逸民兄,奉书不胜惊叹。弟不日南返,当持尊书面询当局。兄一面向南、王诸先生请教可也,勿烦日好。”被婉言拒绝。信中所说“南、王”是指南汉宸和王炳南。二位与我交情甚深。1930年王炳南出洋留法时,我任杨虎城驻京办事处主任,出国护照都是我给办的。我知道眼下是“人民翻身”的日子,女儿说:完了,完了,家不能保,人不能保,有人说你是反动派,弄不好又进劳改场终身监禁,不如逃走了吧!我自付求情无着反成话柄,遂于1950年旧历四月底偕南京外妇穆××所生爱女,怀着“茫茫天涯何处容身”之心弃家外逃,端午节抵达九龙。从此几经波折,在香港过了30年寓公兼菜农的日子。

鬓如霜 家山乡路情谊长

30多个寒暑,1万多个日日夜夜,我身在

(上接60页)

写完绝命书,阮玲玉把八珍粥和着几十片药片吞了下去,昏沉沉地倒下去了。

唐季珊和阿妈发现,立即送日本人开的福明医院。不巧没有医生值班,阿妈急着要求转院,唐季珊说:

“这是日本医院,不认识阮玲玉,如果送别处,人家认出来,我可是名誉攸关!”

阿妈急了,打电话给林楚楚,林楚楚同黎民伟赶

他乡,哪一天不想千里家乡一日还。可是“山色湖光跻脚底,秋客晚景触心头”,“欲上高楼还却步,怕将老眼望中原”。在香港与曾在民国元年时同登龙虎榜的国民党老外交家谢湘重聚,谈及一生如履薄冰的宦海生涯,想起家乡一草一木,每每唏嘘良久。

俗语说:好有好报。果然人民没有忘记我。1980年秋,囚友方志敏之子方兰专程来港问及方志敏遗稿传递详情,我婉言流露思乡之情,很快,我得到党和政府的帮助,不久就回故乡定居了。

那一日,回到故乡浙江省永泉县,县委书记和县长在招待所宴请我。忆旧睹今,酸甜苦辣一齐涌上来,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,我激动得只说了一句话:“伟大,伟大,共产党伟大!”

全国政协邓颖超主席得知我以百岁高龄走完坎坷之路,落叶归根,备加关怀,赞我追随孙中山,为孙中山扶灵和传递方志敏遗稿有功。中央办公厅还发出专函,嘱当地政府从优安排,免费分给我3室一厅新住宅,颐养天年。

路,曲折的路,迷茫的路,幸运的路。世态沉沦,是耶非耶已有分说,我这个三番建狱,四次坐牢的国民党中央监狱长,如今算是“大器”晚成,才真正懂得了一些为人哲理和人生的真谛。

(辽宁省政协文史办供稿)

责任编辑 谢凤英

来,送到中国疗养院救治。第二天阮玲玉呼吸微弱,下午2时半她失去知觉,傍晚6时半,也就是三八妇女节日子,阮玲玉停止了呼吸——一代影星殒落了。

阮玲玉死时才25岁,风华正茂,她的自杀,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。她死后电影界给她以“一代艺人”之誉。

(广东省政协文史办供稿)

责任编辑 谢凤英